



革命年代

谢本书 冯祖贻 高光汉
顾大全 孙代兴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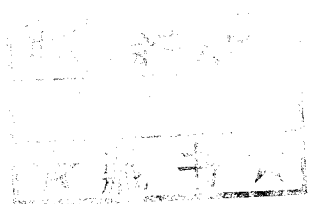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 藏书 ★

K258.3/2

56512



200308808



獲國逢年史

谢本书 冯祖贻 高光汉
顾大全 孙代兴

贵州人民出版社

书名题字 黎澍
责任编辑 叶光大
封面设计 兰 钢

护 国 运 动 史

谢本书 冯祖贻 高光汉
顾大全 孙代兴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60千字 插页11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

书号 11115·61 定价 2.00 元



孙 中 山



黄 兴



梁 启 超



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蔡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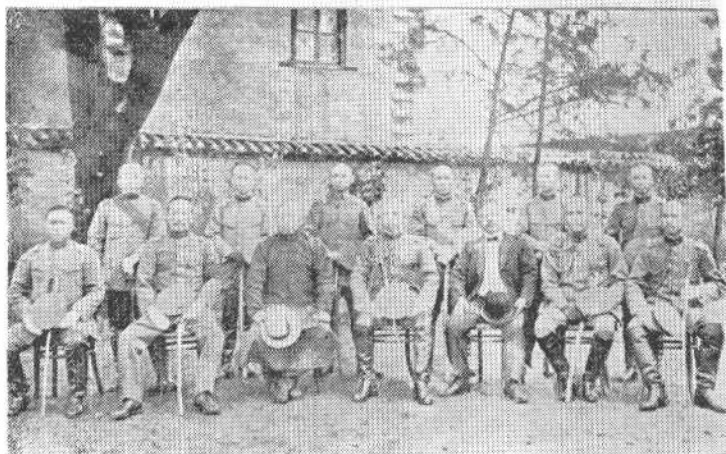


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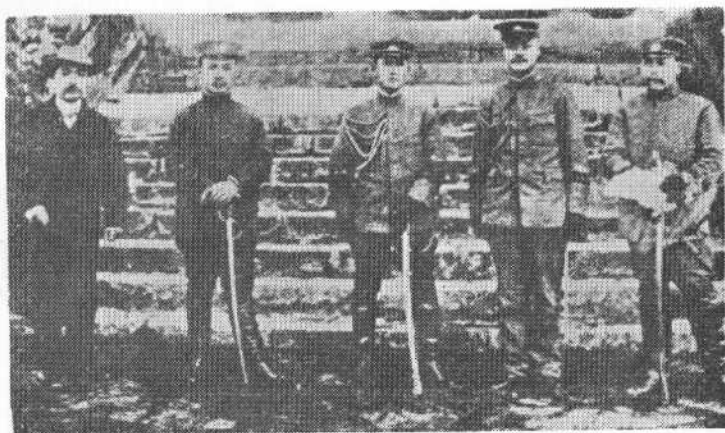


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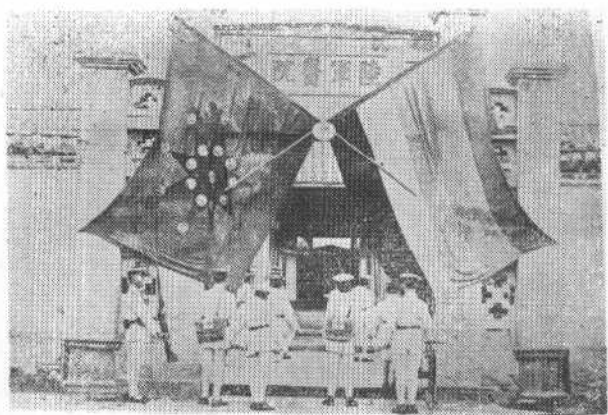
雲南護國軍重要人物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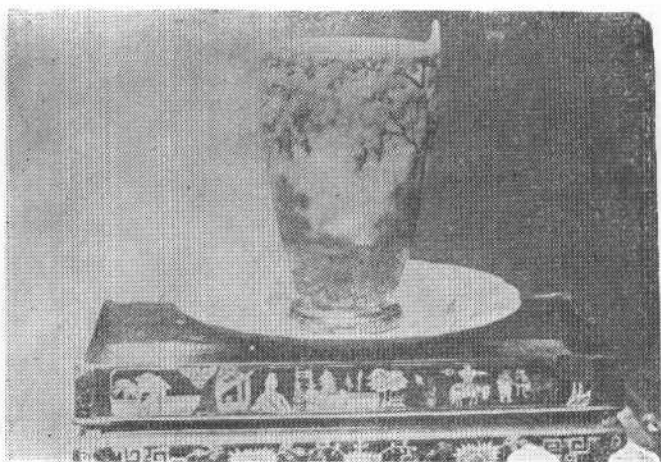
云南护国军重要人物：从左往右第一排李友勋、张子贞、任可澄、唐继尧、张耀曾、叶荃、庾恩赐；第二排陶凤堂、钱开甲、马为麟、赵世铭、蒋光亮、唐继虞。



蔡锷（中）与护国军部分将领



护国起义五色旗、十八星旗



云南第五次会议歃血为盟饮血酒之罇

附錄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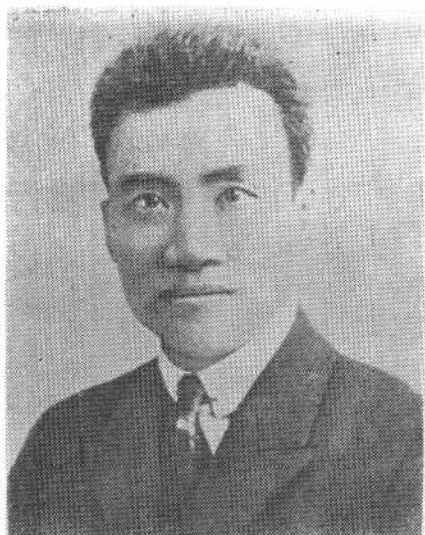
羅文輝

[illegible]

遺墨之一

此乃一舊極端之失平衡
國子因而抗墮此亦當
引為大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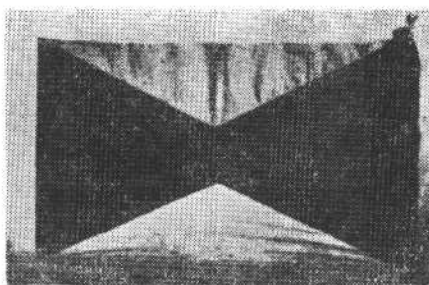
蔡锷手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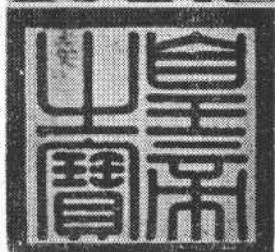
朱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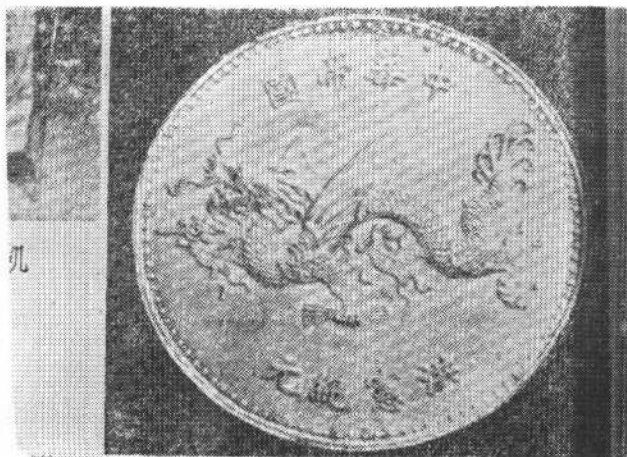
刘
伯
承



袁世凱稱帝時之“洪憲旗”



袁世凱及其“玉璽”



洪 憲“龍 元”

前 言

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为主要内容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运动。这个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新的特点和意义。所以，孙中山曾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致电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和北京政府国务院，建议定云南起义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虽然这个建议并未变成事实，而只是把云南起义日作为国家纪念日之一，但它表明了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及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把护国运动称作“第三次革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较长时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中，没有给护国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直到最近，护国运动的历史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模糊的，不清楚的。在相当一部分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中，涉及护国运动时，大多语焉不详，有的还有错误。

西南地区的史学工作者觉得有责任也有义务来承担护国运动史的研究和写作，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尽自己一点菲薄的力量。这里谈一谈我们对护国运动史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

一、护国运动爆发的必然性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沿着一定的客观规律前进的，这种客

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发展是前进、上升的运动，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然而，历史的前进、上升运动，却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的，它常常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运动。换句话说，历史在其前进、上升的道路上常常是曲折的和迂回的。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①列宁说：“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②又说：“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③毛泽东也说：“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④历史在其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迂回曲折以至出现暂时的倒退，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难以避免的。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迂回曲折和倒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避免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迂回曲折和倒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和在政治上的动摇所致。其时，封建的自然经济笼罩着整个中国的大地，而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宰割又使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这样，封建的、买办的势力就成了扼杀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也成了封建帝制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只要这个基础还存在，那末在一定条件下，复辟的危险就随时都是可能的。辛亥革命时期，近代中国以玩弄权术著称的大军阀袁世凯，就依赖于这种反动的社会势力，控制着当时最大的武装力量，利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翻云覆雨，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①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

② 《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492页）

③ 《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2页）

④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2页）

又一步一步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终身大总统，最后黄袍加身，当起“洪宪”皇帝来了。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倒退，而这种倒退在当时却包含着某种必然因素。我们知道，革命只有不断地清除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才会获得最后的结果。旧的基础没有清除，复辟的可能性随时都可能转化为现实性。正如马克思说：“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①

尽管，历史的倒退、帝制的复辟存在着某种必然性。但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这个历史前进的洪流却是不可抗拒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之一，就在于它“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②因此，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不管是袁世凯的复辟，还是张勋的复辟，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这就是说，尽管复辟是很难避免的，然而反复辟的斗争则更具有历史的正当性和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公开暴露以后，资产阶级的各派政治力量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原因。实际上，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除了一小撮封建余孽和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打倒袁世凯成了举国一致的目标。由此可见，反袁护国运动的爆发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毛泽东说：“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③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护国运动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为主要目标，其核心问题是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页）

②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③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1页）

要维护辛亥革命在中国开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二、护国运动的发动者及其领导权问题

谁发动了护国运动，又是谁领导了护国运动，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说，不能简单地把护国运动的发动者归结为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历史事实证明，把护国运动的发动者简单地归结为孙中山、梁启超或蔡锷、唐继尧，都未必妥当，也未必确切。实际情况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翼——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以蔡锷、唐继尧等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席卷全国的人民群众反袁浪潮的基础上，联合发动了反袁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以后，并未放弃他的理想——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尽管他最初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清晰，但是随着袁世凯独裁卖国的面目日益暴露，他逐渐认识到：“袁世凯的独裁较之清王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①毅然高举反袁斗争的大旗，在“二次革命”中，孙中山明确指出：“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一人之身。”^②随后，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就是要“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③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逐渐败露以后，孙中山即指出：“第三次革命为不可少之举。”^④今日救国，只有打倒袁世凯，“舍

① 《孙中山致美国德崔克的十封信》，（《近代史资料》1979第四期第4页）

② 《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③ 佚名编：《总理遗墨》影印本，第5页。

④ 邓泽如编：《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卷三，广州述志公司1927年影印版。

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①积极筹画，组织中华革命军准备武力讨袁；同时，孙中山派遣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负责人吕志伊以及革命党人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但懋辛等人来到云南，策划云南早日起义反袁。在护国战争爆发前后，孙中山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推翻袁世凯，重建民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曾指出：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②因此，应该说，护国运动的发动与孙中山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军事实力不大，因而在护国战争中没有成为反袁武装力量的主力。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领袖黄兴，虽然曾经对袁世凯有过幻想。但是当袁世凯的真面目暴露以后，黄兴也毅然投入了反袁斗争的行列，二次革命中被举为南京讨袁军总司令。一九一四年八月，李根源等人在日本组织欧事研究会，黄兴其时已赴美，但后来承认自己为欧事研究会会员。实际上黄兴是欧事研究会的名誉领袖。欧事研究会虽以研究“欧事”为名，而注意力仍在国内问题上。黄兴曾“重申反袁到底之决心。”^③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败露以后，黄兴一方面致电孙中山，表示在未来的反袁战争中，极愿效力；另方面派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张孝准，与蔡锷“密取联系，相助进行。”又命石陶钧回国，“参加全国一致的讨袁工作。”^④还电促与西南关系较深的老官僚岑春煊回国主持讨袁大业。黄兴事实上起着革命派与改良派、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络的桥梁作用。护国战争爆发前夕，黄兴电催李烈钧等入滇，参与护国起义，断言护国

①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1963年版，第593页。

②《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

③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61页。

④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石陶钧：《六十年的我》（均见毛注青《黄兴年谱》，第268页）

战争必胜。他还说：“蔡君（锷）军事优长，亦负众望，指挥如意，所可断言。”^①他不仅在海外等集巨额款项汇回国内，支援反袁战争，还认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②通电全国，号召协力策进，务除祸本。欧事研究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最后都投入了反袁斗争的行列。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以后，一直追随袁世凯。但是，筹安会打出招牌不久，梁启超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全国人民反袁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梁启超在袁世凯的鼻子底下，抢先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长文，举起了反对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旗号。这位以“善变”著称的大人物，把他的天津寓所当作了策划反袁起义的秘密机关。梁启超就是在这里与蔡锷、戴戡等人对后来反袁护国战争的发动及其进程，作了具体的策划和切实的部署。云南反袁护国战争爆发后所发布的一系列文电的初稿，也是在这里草拟的。梁启超在事实上策划了护国战争，扮演了护国军的军师的角色。

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有密切联系的蔡锷，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在反袁护国战争的发动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个人物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曾担任辛亥云南都督，与西南地方各省的实力派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保持着特殊的关系。蔡锷在护国运动、特别是护国战争中，起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西南地方实力派相互联系的纽带作用，成为各种反袁政治派别联合的象征。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另一代表唐继尧，直接控制着云南的武装力量。他在滇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督促和支持下，转入反袁阵线，使反袁护国战争获得了后方基地，增加了护国起义的安全感，也扩大了护国运动的影响。

① 《复彭丕昕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423页）

② 《致全国各界讨袁通电》（《黄兴集》，第427页）

上述各种政治力量对反袁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的发动在不同程度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说，反袁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席卷全国的反袁革命浪涛声中，联合发动了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

护国运动开始以后，特别是一九一五年底护国战争爆发以后，护国运动的领导权落到了谁的手里呢？在理论上可以说，谁发动了运动和战争，领导权就掌握在谁的手里。然而在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当护国运动兴起之际，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以云南宣布独立为标志的护国战争，是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多年宣传、组织反袁斗争的总汇合，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把民主共和思想在海内外中国人中广泛传播的结果，是孙中山数十年如一日地奔走呼号、辛勤劳累培育的革命种子发出的芽，开出的花，结出的果。例如，在云南军队中有许多年轻军官是孙中山亲手创建的同盟会的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始终把孙中山奉为领袖，追随孙中山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批年轻军官对于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早已痛心疾首，积极酝酿反袁方略，不断派人与海内外革命党人联络。早年曾加入同盟会、现时的云南将军唐继尧曾上书孙中山，请他主持全国的讨袁斗争。唐继尧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革除专制，还我民权。”袁世凯乃“枭雄窃柄，大盗移国，会设筹安，欲行帝制。……继尧自入同盟会以来，受我公革命之训导，义不苟同，秣马厉兵，待机报国。云南全省人民亦复义愤填膺，誓不与此贼共视息。……窃盼我公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一切机宜，祈予随时指示，得有遵循。”^①

然而，随着护国运动的推移，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护国战争爆发以后，护国运动即以反袁护国战争为其主要内容，因而谁

^①由云云：《护国史稿》（《近代史资料》1957第四期）